

环境、社会与绿色发展

——2016年第五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龚文娟,梁迪

(厦门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我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已经“驶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第五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围绕“绿色发展与环境社会学”召开,深入探讨了影响我国绿色发展的理念、行为方式和治理机制。与会研究成果呈现了本土性与全球性兼容、多学科融合、议题和方法多元化的特点;未来需要进行更多批判性、反思性与建设性兼具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与会者就“中国环境问题的应对与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走绿色发展道路”达成共识。多元主体如何参与及如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处理环境、社会与绿色发展关系的关键。

关键词:环境与社会;绿色发展;环境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7)01-0073-11

从地区雾霾到全球气候变化,从游牧知识应用、地方文化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从公众健康、风险分配到环境公正,从民众的无序抗争到有序参与,从环境运动到环境公民的培育,从政府环保工作的开展到民间环保社会实践,环境问题的影响面之广、影响维之众、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间的张力之强、社会各阶层关注和应对环境问题的决心之高,在21世纪之前的中国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第五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16-19日,厦门)将主题确定为“绿色发展与环境社会学”,旨在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为基础,从不同层面探讨中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届研讨会由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厦门大学人口与生态研究所承办。来自全国各地70多所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和期刊编辑部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展现了我国学术界对环境与社会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考虑到研究视角多元化,本届研讨会未设主题报告,而是围绕“绿色发展与环境社会学”分设“绿色发展与环境社会学理论”“环境意识、环境行为与绿色生活方式”“民族地区与绿色发展”“环境抗争与绿色发展”“国际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邻避、环境公正与绿色发展”“环境风险”“环境治理与绿色政治”“社会多元主体与绿色发展”九个分论坛。本文概述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以期与更多同仁分享和交流。

一、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

理论是一门学科赖以存立和发展的基础,但在我国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与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相比,理论研究显得薄弱^[1]。本次会议上,与会者们梳理、比较了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并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和学科建设进行了讨论。

环境社会学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在欧洲也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在卢春天(西

【收稿日期】2017-02-16

【作者简介】龚文娟(1979-),女,重庆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安交通大学) 看来, 尽管美欧主要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探究对象都是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但在对环境理解、理论基础、理论目的和应用等方面, 美欧环境社会学表现出了较大差异。美国环境社会学理论更多地传承了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思想, 致力于寻求学科合法化和独立的依据, 并从多维角度解释环境问题产生及其恶化的原因; 欧洲环境社会学理论则更多借鉴现代社会学理论, 并不谋求学科独立地位, 更为关注如何通过环境改革来提升环境质量。回顾美欧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呈现——多学科融合、多样性发展、本土性与全球性兼容、批判性与建设性并立的趋势。对于理论构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 赵万里(南开大学) 认为欧洲环境社会学的起源背景不完全和当时经济发展有关, 因为欧美环境社会学关注全球环境的变化,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多的是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实践导致的环境问题。

按照邓拉普与卡顿提出的生态学分析框架, 文化系统对自然物理环境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确, 在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中, 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觑。任国英(中央民族大学) 梳理并评述了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民族生态学等理论, 指出: 深入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 对当地文化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挖掘, 有利于探查问题出现的原因, 并有利于从其他民族自身文化中找到解决办法。她强调了人类学之于生态环境的意义。在理解和应对环境问题的过程中, 站在生活者的角度看问题, 尊重地方文化和知识, 这一点在与会学者中达成共识。

当然, 环境问题不仅涉及经济、文化、制度安排等社会事实, 还涉及自然事实。赵万里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科学与环境问题、环境治理的关系, 指出科学技术会产生非预期后果, 也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科学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的重要交叉点是环境知识, 但前者更为关注关于环境形态和演变规律的环境科学知识, 后者更注重环境知识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分析。科技如同双刃剑, 在提升效率解决问题的同时, 也可能制造问题。以城市交通污染为例, 它不仅是技术问题, 也是社会

生态问题, 但学界(主要是自然科学界) 对交通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 何玉宏(南京交通学院) 表示, 有必要从交通社会学视角考察城市交通发展的绿色转向。中国汽车保有量提高, 面临严重的能源、土地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挑战, 交通不只是路与车、通与达的物理问题或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由车、路、土地、能源、环境和人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问题。从交通社会学视角来看, 交通问题是交通流量在局部空间和时间上的堵塞, 交通网络在系统结构和功能上的失衡, 交通对象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错位。因此, 倡导与环境、资源、社会、未来和谐的绿色交通(生态的、心理的), 并就环境问题开展跨学科合作的意义由此呈现。

近年来快速发展和应用的复合环境流理论, 在全面系统分析各类环境问题实质、辨识关键社会驱动因子和社会网络, 并构建涵盖完整环境流的共治空间等方面, 跳出了以往在科学研究中学科分割的弊端, 被视为面向可持续发展构建跨学科和多学科聚焦研究的理想框架。张磊(中国人民大学) 详细介绍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环境流理论”产生的背景、内容、全球范围内的实证研究以及对中国环境管理的启示, 她指出: 管理城乡复合生态系统, 传统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方式已经不能胜任, 应淡化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诉求, 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参与、协商共治的新型开放式管理模式, 即管理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 在信息充分、可靠的前提下, 保障利益相关者合法参与决策和实施。开放式环境共治理念, 激起了与会者们的研究共鸣(详见后文“环境治理中的社会多元主体”), 政府在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上, 不再一方独大, 需要积极转变其角色。

作为舶来品, 环境社会学发轫于西方社会, “他者的”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我们的”环境问题, 值得反思, 因此“理论自觉”亦是学者们努力的方向之一。环境社会学在我国经历了约二十年的发展, 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出现了社会转型论^[2]、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论^[3]、次生焦虑论^[4]、理性困境论^[5]等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多维度和

多层次的理论分析。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展开梳理,彭远春(中南大学)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影响与生态环境约束的日益突显、消费主义的盛行与绿色生活的推崇、环境问题的聚焦建构与环境行动的虚拟支持、环境不公的全球扩散与共同行动的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的着力推进与环境治理的不断深化,我国用了约三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现代化道路,时空压缩衍生了复杂的环境问题和治理生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遭遇了现实和理论双重困境。在李勇进(兰州大学)看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缺乏生态环境的民主治理和公共监督,从制度的制定到具体的实施以及监督评估都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程度很低,且缺乏参与意识。再者,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文明建设评估体系不完善,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撑,环境保护缺乏民间文化基础等,也是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因素。还有一重困境,就是人们并没有对生态文明的属性和内涵形成清楚一致的认识,更没有相对完整、成熟的系统化理论。事实上,有很多较成熟的理论可供生态文明建设借鉴,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社区参与理论、生态人类学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环境话语理论等。

如果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那么队伍建设就是一门学科发展的保障。王书明(中国海洋大学)强调了学科社群规范性建设的重要性,认为环境社会学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科,并开辟出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如环境抗争、生态移民、人水和谐、海洋环境治理、生态建设等。本土化、中国化研究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与国际研究对话的必要性,提倡中国环境社会学应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加强国内外学术对话和合作。此外,王书明指出社会学二级学科的分类不够合理,环境社会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

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公众

的环境意识、环境关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引入了在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的NEP量表对其进行检测和修订,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关心测量工具^[6-14]。吴灵琼(南通大学)基于洪大用(2006)和吴建平(2012)所构建的中文版NEP量表,改良并发展了分别针对我国城市小学生群体和大学生群体的NEP量表,从内部一致性信度以及结构效度两方面检验了NEP量表在城市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并对其进行修订,形成学生版NEP量表。研究者认为由“自然观”“浅层生态观”(强调价值认知)和“深层生态观”(强调价值判断)所构成的三维理论模型较原量表五维度以及单一维度理论模型更能与数据匹配。本届论坛持续关注环境关心和环境行为研究,年龄和性别仍是考察公众环境关心和行为的重要维度。王晓楠(上海开放大学)基于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依据“环境对话”理论框架从物质、观念、实践三个维度,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物质层面个体变量(年龄、性别、居住地、党员身份)、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环境信息获得、生活消费水平;观念层面的环境认知、环境风险感知、环境信念、社会信任;实践层面的政治参与,对居民环境行为意愿存在显著影响。郭月青(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和节水行为发生频度进行了社会性别分析后发现,男性关注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和经常节水的行为可能性均低于女性;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的人节水的可能性低于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人。此外,就业状态、社会参与虽对环境关注影响不显著,但对节水行为影响显著。对大学生群体中的节能行为研究,也发现性别、年级对学生用电行为有显著影响。顾金土(河海大学)及其研究团队对H高校学生寝室节电行为进行的现场试验研究发现,一方面,学生用电行为近乎处于放任状态,季节、性别、年级、居住楼层及阴阳朝向等显著影响学生的用电行为,主体认知和环境共同促成学生的用电行为;另一方面,在将研究结果反馈给学生后,干预受试者的用电行为后,现场干预效果同样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即信息反馈对男生效果显著,对女生效果存在内部差异,本科四年级女生和研三女生存

在正面效果,研二女生存在逆反效应。20 世纪 90 年代后,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性别与年龄差异,成为国内外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因测量方法和研究群体差异等原因,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

本次研讨会上,“可持续消费”成为环境行为专题中热议话题。“可持续消费”于 1994 年在奥斯陆专题研讨会上正式提出,1994 年 UNEP 在内罗毕发表《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首次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小化,从而不危及后代人之需求。张敦福(上海大学)将餐桌剩饭问题链接到可持续消费行为,并探讨了中国的饮食与生态风气变迁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剩饭体现了家庭、爱和亲密关系;另一方面,从剩饭中透视生态风气变迁。中国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粮食短缺和人们激进的生态观,改革开放后充足的饮食供应和人们的可持续性生态观。不同年代的人对食物态度的变化,经历了从对激进经历的体验和回顾到对可持续性环境意识对环境生态的关心。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论认为人们在实现温饱后,开始倾向于关心环境,表现环境友好行为。在欧洲,可持续消费研究经历了“实践”转向,范叶超(中国人民大学)介绍了这一新范式的背景和欧洲研究现状。欧洲可持续消费研究有两项传统范式:个体主义研究范式关注个体消费者的环境关心和亲环境行为,其不足在于可能导出环境关心与行为之间的落差与不一致的结论;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主要关注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其不足在于可能导致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的环境决策过程。为了超越二者不足,欧洲可持续消费研究把目光转向社会实践理论。社会实践是在特定时空情境之中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一组惯例化的行为,是能动性和结构的交集。社会实践论具有以下特征:高度惯例化、被视为理所当然、需要具有与实践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成员演绎、被目的一情感结构所整合、包含有一定的物质元素或内容、位于一定的时空之中。

本届研讨会上,呈现出一批具有国际性视野

的研究,中国学者通过实证调查和数据对国外的环境问题进行了考察。王琰(南开大学)基于“生产跑步机”、生态现代化和环境流等理论视角,利用来自 41 个国家 8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地分析了人和信息的流动性如何影响了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三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她发现,与生产跑步机的理论预测一致,人的流动性与温室气体排放呈正相关关系,流动性越高,温室气体排放量越大;生态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则更好地解释了信息流动性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即在科技的推动下,信息的流动可以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刘敏(中央民族大学)则考察了南非的鲍鱼偷猎与全球走私活动。他发现,在全球资本及华人黑帮的影响和支持下,鲍鱼捕捞在南非日渐从一种合法的生计行为演变为非法的犯罪行为,并逐渐形成了偷猎者、中间人、加工者与走私者等四层结构为一体,偷猎、黑市交易、非法加工、走私与销售一条龙的有组织跨国犯罪网络。在南非沿海渔业社区,偷猎对南非近海生态保护及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占用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加重底层渔民的粮食安全问题。此外,鲍鱼偷猎与全球走私也使得底层渔业社区的社会治理风险加剧,南非近海渔业资源占用过程中的环境公正问题凸显。

三、区域环境问题与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通向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风尚之路,也是发展中地区积极转型发展模式的必经之路。

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沈殿忠(辽宁社会科学院)指出,东北产业结构过分倚重自然资源,东北资源枯竭性城市较为普遍,其中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非常突出,因此,东北绿色发展的转向十分重要。同样,安和平(贵州大学)也认为产业结构转变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他认为探索节能减排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关键。

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环保缘何不能鱼与熊掌兼得?柴玲(中央民族大学)认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存在二元产权悖论,即西部地区国有

产权和社区产权共存。在国有产权和社区产权共存的状态之下,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呈现矛盾和冲突,如社区资源被束缚、社区传统产业陷入停顿、生态产权与经济产权之争等。如何寻求环境保护与地区发展的平衡?公众参与、社区实践或为可探索路径。西部地区历次环境退化及气候变化引致的灾害,给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尤为显著,西部地区如何从自然灾害的被动接受方转变为主动的生态位适应?蒋尉(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在现有的治理框架下,构建有效的多层治理体系,实现系统的“绿色”转型,可增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有效性。同样在农村环境问题上,绿色转型也势在必行,并且应该是全方位的,从农民绿色意识的培育,到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到可持续产业结构的打造,等等(张晓琼,曲阜师范大学)。

某种程度而言,民族地区环境问题的应对和解决更加敏感和紧迫。关丙胜(新疆师范大学)在《守边与跨界:阿勒泰山腹地塔克什肯地区的环境与边境社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边境社会研究概念,分析了包括边境线两侧(内边境、外边境)、边境地区人群、人群规模、社会的边境规制、两侧差异等内容。他在对塔克什肯地区的大环境与小环境描述的基础上,梳理了近代国家边境划定前后族群游牧、迁移和国家边界的跨越乃至守边汉人群体的进入历程等情形,呈现出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规制、人群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再塑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边境地方社会特质,并引发了关于环境、游牧族群、国家边界以及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等重要问题的讨论。

地方文化参与和传统知识的运用,在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中显得十分重要。阿拉坦宝力格(内蒙古大学)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进行分析后指出:在产业化转变进程中,必须重视地方文化,认真思考地方文化如何参与绿色环境建设问题。他倡导建立居民参与式管理模式,政府部门与当地居民相互协同合作,建立有效的生态安全机制。地方文化与知识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在本届研讨会上得到诸多学者的强调。同为民族地区环境问题研究学者的孟和乌力吉

(内蒙古大学)系统介绍了内蒙古的山地知识,并且借助图片展示了山地与内蒙古及其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孟和乌力吉描述了生态环境与游牧经济的关系、生态环境与游牧社会的关系、生态环境与游牧文化的关系以及山地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他倡导“政府支持、社区主导和社团参与”的三维一体模式,遵循个体经历、群体参与、科学评估和合理调整的应用路径,使用“就地就近”“活人活用”和“持续运行”的方法传承应用蒙古族山地知识,以达到环境保护、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学者们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环境问题的重视,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学界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公正问题的关注,对国家政策制度安排的关注。

四、环境风险

社会转型加速期,各类环境风险事件及其导致的社会矛盾频发,学者们就环境及社会风险产生机制及应对策略进行了讨论。在荀丽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看来,干旱既是“天灾”,更是“人祸”,她认为干旱区水资源危机是天然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叠加的后果。理解干旱危机变迁的线索有两条:一是以“水”为中心的农业转型,二是工业开发中的水资源公共治理盲区。不合理的农业开发移民和不合理的制度配置,导致竞争陷阱、社会利用集权化、社会排斥和公益盲区,进而产生了人口与水资源承载和土地开发失序带来的水资源危机。技术本身有社会性和文化性,反映权力结构,所以,对水利技术的应用要回到社会文化脉络中去。而这其中最值得反思的是国家建设逻辑:以资本和技术投入为核心的生态建设,迈向以制度供给为核心的生态治理,实行社区自主性与技术选择。洁净的水源和空气是万物生长的必要条件,我国目前不仅面临水危机,还面临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而在空气污染风险面前,真如贝克所说“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吗?焦开山(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呈现出一

种曲线相关。处于中等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其空气污染暴露水平是最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社区其空气污染水平都相对较低。此外,空气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具有显著的差异: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空气污染对健康的损害是最大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空气污染对健康的效应不断减弱,从而使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地区的群体和生活在空气污染不严重地区的群体在自评健康上的差异逐渐缩小。关于环境风险在人群中是否公正分配问题,在我国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体现一种理论关怀、政策关怀,更体现一种人文关怀,弱势群体是否正承受第三重弱势地位,是社会各界都应关心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一些具有环境负外部性(如废水、废气、废渣、辐射、生物多样性流失等)的大型工程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兴建与运营,工程项目的损益不匹配催生了民众抗议,其社会风险凸显。本次论坛上,学者们对此类工程项目的环境风险及社会风险进行了讨论。樊良树(华北电力大学)根据工程污染程度划分了轻度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如变电站、信号基站等)、中度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如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等)和重度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如PX项目、核电厂等)。面对不同类型工程,民众的反应也不相同:对于轻度项目,参与抗议的民众较少,抗议过程较为和平理性;对于中度项目,参与抗议的社会阶层多元化,维权方式不拘一格,集体分工、接续努力;对于重度项目,“污名”的社会放大与环境维权动员互为表里,民众将维权矛头指向地方政府,参与者众多,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兼而有之。被学者归为重度环境污染型工程的PX项目,究竟存在哪些环境风险?公众对其接纳度如何?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的传递耦合机制是什么?龚文娟等(厦门大学)使用福建省PX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价数据,考察了该省重化工PX项目的环境风险分配情况和普通公众对此项目的风险接纳情况。研究发现,从环境风险技术评价角度而言,该PX项目的常规环境风险(如 H_2S 、 NH_3 、 NO_x 、 HCl 、 CH_3OH 、

CO等排放量)和事故环境风险(如PX项目泄漏半致死浓度内的人数、事故概率、风险值)在可接受范围内,但公众拒斥该项目。社会风险评估发现,公众的风险感知、环境价值观、系统信任及风险沟通状况显著影响他们对PX项目风险的接纳。据此,研究者认为,对于重化工项目的风险管理,单纯的低环境风险告知、技术性劝说甚至政治“操纵”不但不能提高公众对项目的了解和接纳,反而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面对各类环境风险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我们该如何应对?王芳(华东理工大学)提出构建“多中心化:合作与制衡”的风险复合治理结构,即由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种风险治理机制各司其职,政府、企业、科技专家、大众传媒、社会组织及公众个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合作与制衡的环境风险复合型治理结构。政府权威参与、企业自律参与、社会组织自治参与、科技专家做诚实代理人、大众传媒做生态启蒙与环境公正的促进者。荀丽丽认为以制度供给为核心的生态治理,应尊重和重视社会文化。龚文娟强调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和风险沟通机制,重建系统信任。

五、邻避、环境抗争与环境公正

对环境污染的规避,是人类的本能反应。西方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邻避”^①,中国台湾地区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邻避”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对有中国特色的“邻避”冲突进行了深入分析。就“邻避”的影响因素而言,周志家(厦门大学)分析了系统信任和公平观对居民对垃圾焚烧场邻避情结的影响作用,认为临近性/暴露并不必然影响居民的邻避情绪,而较低的基层机构信任是诱发居民邻避情结的因素之一;在公平观方面,体制决策公平观越强的居民,其产生邻避情结的可能性越小,而持参与决策公平观和结果公平观的居民出现邻避情结的概率较大。高新宇(河海大学)发现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以及温和型运动策略、环保组织的介入均影响邻避运动成功与否。

^①“邻避”(Not In My Backyard)是指社区居民反对在其居住地附近建设诸如变电站、垃圾掩埋场等具有环境负外部性的公共设施。

单一主体分析能否有效解释邻避机制?与会者认为对邻避冲突的理解和认识应该从对单一主体的分析转向对多元主体的考察。卜玉梅(厦门大学)运用风险建构和框架化理论,探讨了邻避冲突中行为主体的话语运作及其被抗争行动者解构的过程,发现在邻避项目推进及冲突应对过程中,地方政府、环评机构和运营企业分别以规制话语、科学话语和技术话语运作于关于风险的社会竞技场中,并以这三种话语为基础,构建起项目的合法性逻辑。行动者则在抵制、申诉过程中,将之予以层层解构,其策略是从对风险的焦虑,转向对抗争对象合法性的质疑和挑衅。在持续的互动和博弈过程中,决策系统的合法性“缺陷”逐步凸显,行动者抵制邻避项目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得以构建,而这最终所影响的便是项目的进程和冲突的结果。

关注邻避运动“负功能”的同时,也应正视其在环境治理特别是环境公民培育方面的“正功能”。谭爽(中国矿业大学)认为邻避运动有助于构建包括“环境权利”“环境责任”“环境美德”三个维度在内的“整合型环境公民”,她梳理了“政府决策”“环境NGO”“社区人际网络”“媒体报道”四要素在环境公民成长中的作用路径。

作为环境风险带来的最直观的社会风险,环境抗争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陈占江(浙江师范大学)对农民环境抗争进行研究后,发现无论是制度化抗争还是非制度化抗争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表达性困境、乡村社会分化与聚合之间的组织性困境以及环保组织与乡村草根之间的合作性困境。要超越这三重困境,需要分离与重构政经制度,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创生与再造连接机制,赋予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以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说环境抗争是环境风险引发的直观后果,那么环境公正正是环境风险分配背后的“隐议题”。李德营(山东理工大学)对采煤区的地理—社会分布分析,发现大部分沉陷区都是耕地,甚至济宁市绝大部分的采煤沉陷区都是分布在乡村地区。此外,他对相关的政策文件分析发现,当地城市区域、铁路沿线实际上也蕴含着煤炭资源,采煤区地理—社会分布现状主要是社会安排的结果,正是公权力的安排(政府

的政策规划)导致了济宁市的沉陷区主要分布于乡村,使乡村地区成为被牺牲的区域。同样因为公权力的安排问题,居住在这些区域的居民还承受补偿救济分配不合理的“二次伤害”。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环境种族主义,城乡环境不公正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问题,备受学界关注^[15-20]。社会空间安排折射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公权力倾斜的背后隐含着利益分配、多元主体话语建构、环境意识变迁、环境政策变迁等因素的动态变迁及其构造的关联。

六、环境治理

面对我国严峻而复杂的环境形势及其带来的各类社会风险,要走向良治,实现可持续发展,单靠某一方的力量不能达成。学者们就“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走绿色发展之路”观点达成一致,并从不同视角详述了我国环境治理。

1. 社会多元主体与绿色发展

第一,肯定政府是推动环境治理的必要力量,但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管理者。正如张磊所言“在开放式环境共治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管理者,它既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员,又凌驾在网络之上,是网络的重要建造者”。向俊杰(桂林理工大学)通过对31个省级环保厅(局)的权力清单进行统计发现,权力项总数、权力项类型数及各类型下的权力项数量差距甚大。省级环保厅(局)的权力边界具有不正常的伸缩性、权力行使的力度差异太大,部分地区的环保权力存在真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权力主体价值观的偏离、相关主体的博弈和欠发达地区对环保权力项数量的刻意约束。而优化省级环保权力清单中权力项数量的路径在于:重塑博弈格局,让公民和人大参与到环保权力清单的制定中来。

第二,企业作为重要的环境利益相关者,其行为直接影响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效果,所以,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感与研发投入等话题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陈宗仕(浙江大学)考察了企业不同形态责任的自身内在逻辑及企业环境责任与慈善责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不同影响机制。他发现环境责任对研发投入具有强诱发的作用,而

慈善责任对研发则是弱分散的作用,企业在创新能力提升上的投入会强化环境责任与研发投入的正向关系,而对慈善责任与研发投入关系没有调节作用。也就是说,我国企业的行为更多受市场驱动,相比见效较快的慈善责任,环境责任通过研发中介提升绩效需要企业的中长期规划。对于企业分布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其生态化转型将成为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契机。任克强(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对苏南地区 1995—2013 年的工业“三废”的排放情况与人均 GDP 水平进行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分析,结果显示苏南地区的污染排放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随着苏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优势正逐步转化为生态优势,无论是“量”上的资金支持,还是“质”上的技术和结构效应的发挥,都能推动苏南工业园区率先实现生态化转型。

相比大企业而言,农村小微企业呈现“私营为主,分布散,规模小”的特点,程鹏立(重庆科技学院)认为这些特征导致乡村工业污染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受益与受害圈重叠,熟人社会的人情与面子等影响村民对污染企业的态度。因此,引导农村小微企业实现产能升级是发展绿色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刘凌(中国人民大学)以定州留村铁网企业为例,分析其环境行为演变历程及其在绿色转型中的环境行为表现,指出农村小微企业在萌芽期、成长期、转型期的环境行为选择与行业生产工艺、组织形式以及企业主的环境认知息息相关,并受到自然环境退化、市场环境变迁、利益相关群体压力和政府环保管控的直接影响。切实推进农村小微企业绿色转型,亟须企业、市场、社会、政府协同合作、共同努力。

第三,环境非政府组织作为环境治理的新兴力量,在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一方面迎来发展契机,另一方面面临重重困境。王旭辉(中央民族大学)选取了 S 机构在内蒙古西北部坝镇的生态治理项目点,以 S 机构在当地的项目运作过程及主体间关系为线索,从嵌入性和自主性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角度,对外源性 NGO 的社区生态治理策略及实践困局进行了讨论。他发现过度嵌入或嵌入性不足都会影响到生态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合

作关系建立及维持。尽管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存在实际困难,但并未影响人们对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发挥有效性的热切期待。刘畅(河海大学)认为,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渗透,环境治理从“大政府”到“大社会”,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使得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凸显。这成为我国现阶段“地方环境主义”的发展基础,同时倡导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同样,张虎彪(河海大学)也认为民间环保组织/群体能和政府实现良性互动;新媒体的作用在于其使得民间环保志愿者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时间空间体制的局限,促进环保志愿者与政府人员的沟通。

第四,媒体传播不仅构建环境问题与环境风险,它亦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刘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认为碳标签是具有显著创新性的生态信息传播介质与气候传播手段。在他的研究中,近七成的大学生愿意向周围人群推荐优先购买加注有碳标签的产品,人际传播是大学生重要的碳标签信息来源渠道。针对居民的气候传播不仅要强调气候变化应对行为的低碳化与低物质化,更要强调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基础上对个人生活需求的关照。

第五,重申社会文化与家族力量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通过对后乡土中国的家族力量及其影响的文化取向研究指出:现代社会中,农业人口的生计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过着城乡两栖生活,加上乡村改造,传统的家族力量逐渐消退,后乡土中国的家族力量正重建起来,新的家族力量是社会性与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家族力量的去政治功能化,即乡村家族已经失去成为乡村政治主体和承担政治功能的基础),家族力量已具有社群化的转向。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后乡土社会中的家族力量的作用机制主要有:文化认同促进团结机制、人情关系的社会支持机制、联合抗争的群体动力机制,后乡土社会家族力量的存在和影响是在现代社会的再建构。

2. 环境治理与绿色政治

环境治理变迁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时空限制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董海军(中南大学)梳理了我国环境治理流变:以新中国成立

工业化进程始,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运动式治理、运动发展时期的治理倒退、世界影响下的应激开拓式治理、体制结构制约下的背离式治理与公众参与下的倒逼式治理五个阶段。他提出,在未来向知识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依托知识和信息资源整合环境的云治理模式将会出现。

环境治理势必需要法律和制度的支持,法律、规范和标准对于有效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陈阿江(河海大学)在区分环境问题的物质状态、技术呈现及社会关注的基础上,谈及“民间标准”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国家标准”与“民间标准”是相对应的范畴,“民标”“国标”中有两重解读维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范畴,“国标”强调的是国家权威的、合法的、强制的标准,而“民标”强调底层的、基层老百姓心目中的环境好与坏。其次是技术测量与民众感受的范畴,“国标”以科学为基础,以技术测量指标为主要评判手段,“民标”则以民众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为依据。环境问题的治理不应只采取“去问题化”策略,而应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是真实的物质世界层面,其次是技术测量层面,再次是社会感知层面。以人为本,既坚持科学的理性策略,也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和需求。在童志锋(浙江财经大学)看来,中国环境立法决策是一个国家吸纳和社会嵌入循环往复的过程。所谓吸纳指的是立法决策者掌握环境决策的拍板权,但也不能完全无视社会意见;所谓嵌入是指参与者通过不同的策略影响正常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既不是单纯的精英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多元主义,而是一个国家吸纳和社会嵌入的多次往返、逐渐达成共识的过程。

作为环境治理重点之一的生态补偿,旨在通过给予生态服务提供者经济激励从而改变其资源利用行为并减少其行为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的生态补偿制度设计和执行遭遇了一系列困境。梁丹(厦门大学)认为,中国森林生态补偿政策的设计不同于其他国家常见的市场化的以自愿为基础的生态补偿政策。这种设计导致森林生态补偿政策的地方实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尽管现有的制度结构反映了森林资源利用的

观念、林权结构和权力关系,而森林生态补偿政策转型中也在不同程度地复制现有的制度结构,但是在其转型过程中,的确出现了新的更具可持续性的森林利用方式,从而形成了未来森林转型的关键转折点。他发现农户对于生态补偿政策内容的了解程度、补偿支付的落实程度对于农户的政策接受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而非补偿金额的绝对高低,因此生态补偿政策应该重新反思“补偿”对于农民而言的真正含义,塑造一种新型的补偿关系。除了林地,我国村落间水资源管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同样有待完善。耿言虎(安徽大学)基于云南M民族自治县田野资料,阐释了流域上下游村庄间的生态联系、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问题的现状以及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原则与方法。M县山区独特的“高海拔就近取水系统”强化了村庄间的生态联系,同时也造成了部分地区水源林使用者与所有者的错位,水源林土地所有者对森林生态的改造引发了下游村庄生产生活用水危机,因此,倡导在尊重、公平、协商和多样化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合理定价、平等协商、多元共治、多样补偿”的生态补偿机制。

七、小结

第五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作为一届只设专题发言和自由讨论环节而没有主题发言和专题评论的学术研讨会,九个分论坛的议程设置和容量仍不能涵盖当下的一些重要环境议题,且还有一些讨论尚待继续,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国环境社会学良好的发展态势(包括研究人员、研究机构、论文、基金资助、政策回应等的增加,“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快车道上加速前行”^[1])。尽管本届论坛话题多元化,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本届论坛上呈现的一些特点:

第一,本土观察与国际研究双管齐下,本土性与全球性兼容。这种兼容表现在两方面:在经验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扎实做好国内环境问题研究的同时,放眼全球环境问题,利用全球性的跨国调查数据或身临其境的田野调查资料,开展国际学术研究和对话;在理论研究方面,从介绍、梳理国外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到批判性、建设性地分析借

鉴国外理论,再到理论本土化,强调本土理论构建的重要性。第二,尝试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呈现学科融合的趋势。“生态复合体”也好,“社会复合体”也罢,都不是哪一门学科能独自探究清楚的,从本届论坛的报告话题(如交通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环境流理论、重化工项目的环境—社会风险评估等)和参会人员/参会论文作者的学科背景(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口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环境生态学、史学等)来看,这种学科合作的趋势十分明显。第三,研究方法多元化(或许这也是跨学科合作的表现之一)。从本届研讨会提交的参会论文来看,学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并且不乏一些新方法,这丰富了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手段,但也需注意“各美其美”。第四,对文化力量的强调,关注地方文化、游牧知识、宗族力量、信仰等,对制度(如环境政策)安排和执行效果的影响。第五,环境社会学从醉心于探究“怎么了”和“为什么”,到关心“怎么办”。对策性研究增加,并且很多对策性研究十分“接地气”,较多从生活者的角度出发,本着尊重地方文化的原则,考察绿色发展的可能路径。第六,就“中国环境问题的应对与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达成共识。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政府不再是唯一的行动者,淡化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等级关系,构建推动中国走向绿色发展的复合社会行动体系。

参考文献:

- [1]洪大用,龚文娟.行进在快车道上的中国环境社会学[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5-16.
- [2]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3]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J].探索与争鸣, 2006(5): 26-28.
- [4]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5]王芳.环境社会学新视野:行动者、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6]郗小林,徐庆华.中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8.
- [7]王民.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 [8]杨明.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 [9]洪大用.环境关心的测量:NEP量表在中国的应用评估[J].社会, 2006(5): 71-92.
- [10]肖晨阳,洪大用.环境关心量表(NEP)在中国应用的再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 2007(1): 55-63.
- [11]“中国公众环境素质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项目课题组.中国公众环境素质评估指标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 [12]洪大用,肖晨阳.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 [13]吴建平,訾非,刘贤伟,等.新生态范式的测量:NEP量表在中国的修订及应用[J].北京林业大学(社会科学版), 2012(4): 8-13.
- [14]洪大用,范叶超,肖晨阳.检验环境关心量表的中国版:基于CGSS2010数据的再分析[J].社会学研究, 2014(4): 49-72.
- [15]洪大用,马芳馨.二元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国农村面源污染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 2004(4): 1-7.
- [16]贾凤姿,杨驭越.城乡环境公正缺失与农民生态权益[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83-87.
- [17]刘春燕.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与行动取向[J].社会, 2012(1): 174-196.
- [18]洪大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与反思[J].思想战线, 2014(4): 83-91.
- [19]龚文娟.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社会空间分配[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49-58.
- [20]孙秀林,施润华.社区差异与环境正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6): 86-93.

Environment , Socie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A Review on the Fifth China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ymposium 2016

GONG Wenjuan , LIANG D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China'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as already stepped onto an express lane and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 the fifth China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ymposium was held to explore ideas , behavior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impacting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The theme of the symposium is " gr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present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 issues and methods diversification. More critical , reflective and constructive fundamental theory-researches and method-researches are essential in the future study. Participants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to deal with and governance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 we need social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and make a green development path". Multiple subjects how to participate and mak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the key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nvironment , social and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责任编辑:章 诚】

(上接第 60 页)

Extractivism and Neoextractivism: Two Sides of the Same Curse

Alberto Acosta¹; Translated by WANG Congcong²

(1.Lat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Faculty , Quito 999165 ,Ecuador;

2.School of Marxism ,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with abunda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ailed to establish a development mode that would enable them to escape from the traps of poverty and authoritarianism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extractivism and neoextractivism. As a mode of accumulation , extractivism distorts the structure of economy and allocation among production sectors , as well as aggravating disbalance of revenues and payments. Despite the fact that several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ith progressive government have become aware of the disease and have made some vital changes to certain elements of extractivism , neoextractivism maintains and reproduces key elements of the extractivism that dates back to colonial times. Therefore ,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tasks i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strategy that will lead to a post-extractivist economy , to offer an "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 , an option that is radically different to current development ideas.

Key words: extractivism ; neoextractivism ; 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 paradox of plenty;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责任编辑:章 诚】